



社 科 学 术 文 库

LIBRARY OF
ACADEMIC WORKS OF
SOCIAL SCIENCES

李 洵 ◎ 著

下 学 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751.38

社 科 学 术 文 库

LIBRARY OF
ACADEMIC WORKS OF
SOCIAL SCIENCES

李 海 著

下 学 集



淮阴师院图书馆 87513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下学集/李洵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8
(2006.5 重印)

(社科学术文库)

ISBN 7-5004-1733-0

I. 下… II. 李… III. 史学理论-中国-文集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5) 第 09043 号

责任编辑 薛 波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28.25

插 页 2

字 数 42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以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各类学术著作为主的本社，自1978年6月成立以来，沐浴着“实事求是”与“思想解放”的时代春风，伴随着日显生机和日益活跃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十数年来出版了大量的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著作，积累了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高层次学术图书。为使其中具有精品性质的图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发挥更大的效用，我们从中遴选出若干种组编为“社科学术文库”。

“社科学术文库”从本社已出版的各类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中拔优选萃，选收那些在各个学科领域里选题重大、研究深入、见解扎实和学风严谨的专著性著作；作者老、中、青兼顾，重名家名作，亦重新人力作。

“社科学术文库”分辑推出，每辑10种，将陆续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11月20日

永远的思念——李洵 《下学集》再版序言

2005年9月，是业师李洵先生逝世10周年忌辰。8月中旬，业师的部分同事、弟子和遗属聚首长春，举行学术研讨会，切磋学问，绍继遗愿，缅怀业师深厚恩泽。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王昊先生承诺再版业师生前自选自编《下学集》。应王昊先生和师母王玉珍女士之邀，为《下学集》再版作序。我们李洵先生的及门弟子、学界的小字辈本没资格膺此荣耀，惶恐之际又不好推辞。心里惴惴者怕道不出业师学术之真谛和人生之磊落，充溢胸间流诸笔端的，唯有思念、思念、永远的思念。

学术渊源

业师李洵，字仲符，著名历史学家。1922年7月1日生于辽宁省北镇县，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北京。1946年毕业于北平临时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48年赴东北大学（后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1985年创建明清史研究所，任所长。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1995年9月2日，因病与世长辞。

业师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继续攻读，就学著名古韵学专家黄侃先生，毕生从事古声韵学研究。受家学熏陶，业师少年时代就奠定了宽厚的文史基础。业师的小学和初中教育是在家中完成的。当时家里藏书颇富，其中以文字学、语言学、古声韵学图书和清代考据学家的著作最多。其

次是历史典籍,《二十四史》、通鉴、三通、续三通一应俱全。再者就是清朝人注经释子的著作,当时流行的梁启超、王国维、孟森、刘半农、夏曾佑的书也布列其间。17岁之前,业师几乎每天都和这些书打交道,觉得钻书堆是件愉快的事。一般家庭的孩子启蒙教育通常使用的教材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而业师的启蒙教材却是《文字蒙求》。除了接受文字、音韵方面的严格训练外,对其后来学术研究影响较大的就是研习梁启超、王国维、孟森等名家的史学著作和点读局本《二十四史》。先从两唐书点起,《宋史》点了一部分列传,点完了《元史》和《清史稿》,《明史》则是上大学后点读完的。

业师的高中生活是在北京的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度过的。在这里,他接受了现代西式教育。这所学校英语和化学教学独具特色,设有可与大学化学系媲美的化学实验室,每年都要向辅仁大学化学系输送几名高才生。因此,业师对化学产生了强烈兴趣,希望将来能读辅仁化学专业。但是业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从事自己的专业。高中毕业,业师报考了两所大学,一是辅仁大学化学系,一是北平临时大学文学院,结果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业师属意辅仁化学系,但辅仁的学费、书费、试验费之高,令人望而却步。自从“七·七”事变后,业师的父亲失业,家庭经济拮据,靠出卖书物度日,实在无法负担这笔经费。不得已,只好去学不大情愿学的历史学专业。

业师走上治史一途虽属偶然,可是少年时家教中的文史训练,加上大学时亲受多位名师的指点,为日后史学建树做了充分的前期积累。先后为业师授业的有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刘盼遂、容庚、陈垣等学术大师。

冯承钧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师从伯希和。为业师授课时,已患半身不遂,便坐着轮椅,由女儿推送并代写板书。冯先生是国内有数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学问渊博,贯通中西,治学严谨,对其从事的专业热爱尤深,把一生的精力全部倾注其中。这种精神对业师影响巨大。业师曾说:“我对历史学产生情感,是和接受冯先生对学术的坚韧不拔精神的影响有关系。”

瞿兑之先生曾给业师讲授秦汉史,很有见解。对青年学生,有问必答,答必详尽。

谢国桢先生是业师进入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启蒙者。1943年下半年，系方公布选修课科目，供学生选择。业师选中了谢国桢先生的“史部目录学”。几天后，教务科通知，选修这门课的只有业师一人，要求重选别的课程。谢先生得知此事后，坚持只要有一个学生选课就得开。于是，业师成了谢先生这门课的学生。鉴于一师一生占用一间教室太浪费教育资源，谢先生就主动约业师到他西城家中授课。谢先生是梁任公之高足，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和藏书家，学识博洽，尤长于明清史研究。先生之藏书，不少外面难得一见的珍本、善本。业师每周四到谢先生家中上课，史部目录学倒成了最次要的内容。主要内容一是聆听谢先生讲述中国古代史专题，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明代的东林党、复社及南明历史，娓娓道来；二是阅读谢先生私人藏书，侧重明清文集、笔记、杂抄；三是向谢先生请教读书做学问的各种问题。一学期下来，收获特别丰富。业师回忆说：“这一学期，不但看了谢先生的宝藏，也亲聆了谢先生关于明清史研究的一些见解和方法，这对我来说，影响是很深的。”

容庚先生是著名的古器物学专家，曾给业师讲授金文课。容先生的敬业精神和冯承钧先生对事业的执著一样，给业师留下极深的印象。业师曾回忆说：“容先生生活清苦，每次都穿长衫骑自行车来沙滩红楼上课，自行车后货架上捆着一大堆书，都是一些古铜器图录。”

陈垣先生是在日本投降后来北平临时大学讲课的，讲的是《二十四史》的编纂、读法、考证、特点等史籍评论课。陈先生把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和盘托出，精当深湛，一些疑难迎刃而解，很受同学欢迎。陈先生的史源学方法让业师受益匪浅。业师说：“他的治学方法，对我的启迪最深。”

刘盼遂先生是业师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刘先生是文献学专家，讲授史料选读课。业师毕业论文题目是《辽宋金三史纂修考》，本来由谢国桢先生指导，后来谢先生离开了大学，改由刘先生指导。刘先生要求很严，业师坐了10个月图书馆，几乎阅遍所有相关文献，抄录了20万字资料，完成10万字的论文。刘先生看稿子很仔细，字斟句酌，不放过任何问题，论文原稿上保留着刘先生很多一丝不苟的蝇头小楷眉批。刘先生说过一句话，业师铭刻心田，那就是“无一字无来历”。业师曾说：“这句话，我每次写文章时都会自然想到它。”

并经常以此而命我等后学。这就是师风、师训。

1946年夏，业师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

业师在吉林市迎了解放，到刚刚从佳木斯迁来的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历史系任教。由此开始，业师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心血和才智。

少年史家

20世纪4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巨变的年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两种命运抉择的年代。从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作为中，业师认识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人民摆脱百年屈辱，并为北平地下党组织散发、张贴宣传品。在1947年春天，业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决策：到东北解放区去，投奔共产党，为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建设效力。1948年，业师在吉林市迎了解放，到刚刚从佳木斯迁来的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历史系任教。由此开始，业师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心血和才智。

业师刚登上解放区大学讲坛时年仅26岁，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中国通史的教学。这种学习是如饥似渴的，而备课则常常通宵达旦。中国通史，业师完整地讲了三遍；这期间，业师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和《资本论》，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好地实践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具体历史实际问题的结合。业师后来回忆说：“解放后有两件事对自己治学有很大影响。一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武装了自己头脑；一是从事多年的中国通史教学，使我对中国史的全貌有个基本的实感。我常常把这种实感称作‘通史感’或叫做‘全史感’、‘整体感’。这种‘通史感’是研究断代史、专门史的主要学术思想基础。所以说一个理论学习、一个教学实践，就构成我从事明清史专业工作的新的基础。前者使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史学天地，真正解放了思想。我可以凭借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去重新估价前人对明清史研究的成果，探索一种新的研究途径与方法。后者使我认真考虑明清史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

业师后来又开设过中国原始社会史、宋元史、中国史、目录学、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1951年后稳定在明清史教学与科研方向上。

当时一些年龄稍长的先生都愿意轻车熟路教先秦史、秦汉史、南北朝史或隋唐史，而明清史是尚待开拓的学术领域。业师对明清史素有兴趣和修养，遂下决心用两三年工夫重新全盘检讨明清史。业师一边系统重温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边研读明清史基本史料。业师用了两年多时间将《明实录》与《明史》对照通读一遍，《清实录》研读到康熙朝，此外还查阅了近千种明清政书、私家史著、文集、方志和笔记小说，作了大批学术卡片和读书笔记。在这些基础上，于1956年完成《明清史》写作，同年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明清史》并非时下意义的“教材”，而是开创性的学术专著。从史料上讲，该书比以往明清史诸大家都有更广阔的搜求和开拓，而最重要的是其理论建树。它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明清两朝断代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是创建明清史独立学科体系的首次尝试。在该书中，业师明确将1368年至1840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十个阶段，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消长和资本主义萌芽发生滋长迟滞为主线，对明清两代重大历史问题均有论列，颇多创见。此书出版时，业师年仅34岁。此书属于早年作品，以现在的目光衡量，虽有很多不足，但毕竟建立起了明清史独立学术体系，为晚清史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范式”，当然也奠定了业师在史学界的地位。该书为几代有志研究明清史的年轻人指明了入门路径，又流传到港台地区和国外，成为国际明清史学术界必读的参考书，嘉惠学界可谓甚大。业师曾反复告诉我们，此书是他的“少年之作”，问题很多，已到了非修订不成的时候了。正是这部学术著作，奠定了业师少年史家的学术地位。

正当业师准备乘春光年少，准备对明清史系列课题开展深入探讨之际，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中国，中断了少年史家的学术研究计划。从此，业师在学界沉寂了二十余年。

历尽劫波

1958年，业师被错划为“右派”，赶下讲坛，发表学术论著的权力也被褫夺。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劳动改造和思想汇报，更让人身心疲惫。但是，对事业执著追求驱动业师在极有限的自主支配时间内坚持阅读明清文集、野史和诗文之类资料，坚持科学研究。

因祸得福，业师在劳动中跌断了右腿，手术卧床一年左右，自主支配时间增多了。业师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剧痛，在病床上开始了张廷玉《明史食货志》的校注工作。业师首先厘清了张氏《志》的史料来源、编纂方法和过程，然后取王原《明史食货志》及王鸿绪《明史稿食货志》与张氏《志》对勘，并以《明实录》、《明会典》为主，兼采明人文集、笔记数百种，为张氏《志》校字、校史 70 余条，改字、补字百余处，作注 1500 余条，使该《志》确乎成为信史。《明史食货志校注》杀青后，在筐篋中沉睡了十余年，无人问津，在业师沉冤昭雪后的 1982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二十四史》食货志校注的第一部，在明史界、经济史界反响很大。著名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评价该书“材料丰富，考订详尽，颇能补日人和田清《明史食货志译注》一书之阙漏，有利学者”，“此种工作我们认为堪称明史功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业师回忆这段经历说：“现在回想起来，也想像不到，当时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是怎样坚持了这种校勘工作的。被错划‘右派’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一共夺去了我二十多年工作时间。但是在这几年中，毕竟算是夺回来三四年的时间。我总觉得这几年是我学习明清史在史料学习上的一次大补课。《明史食货志》的校注工作使我重新读实录，读《明史》，读《明会典》。清代潘来等人从《明实录》中摘录有关史料做经济史料长编的工作，我在这时又几乎重复作了一次，感到收获很大。”业师在坎坷岁月没有沉沦、没有荒废学术，而是积累了功力。待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落实，便焕发出无比的学术能量。

老年学问

1978 年，业师重返高校讲坛。1979 年，被错划“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此后十数年，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多部，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为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和高等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下学集》所收 30 篇学术论文。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业师年逾花甲的作品（仅一篇除外），故谓之“老年学问”。

其中《明代流民运动——中国被延缓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公

元十六世纪的中国海盗》、《公元十六、十七世纪的北京城市结构》、《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等一组论文，是业师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专题的系列成果，也是对完善明清史学术体系的进一步尝试。

业师认为发生在公元十五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流民运动，“实际上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运动，也就是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业师指出“流民运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封建劳役制”，“给社会各生产部门提供了易得的雇佣劳动力，农业上就有可能出现为包租主之类的经营地主所雇佣的农业雇工”；流民运动影响了社会的阶级关系，使“逐末”人口增多，城市浮居人口增多，市民基础扩大，十七世纪出现了市民运动。但是，由于小农经济发达，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顽固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体制诸因素的阻碍，这一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没有完成，显得“虎头蛇尾”。然而，这一过程毕竟产生了影响。“如果认为公元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中某些地区某些行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有新发展的话，那么这种具有原始积累性质的大流民运动，就应视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正式开端。”

业师认为，公元十六世纪的中国海盗是流民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和西方海盗、日本海盗一样，是国内的原始积累过程所伴生的海外殖民活动。“尽管中国海盗的最终命运与西方海盗不同，但是它的历史活动的意义，不容忽视。”

公元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除发生了原始资本积累和自由雇佣劳动形成的历史运动外，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社会习俗、人的观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阶段。业师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其中颇引人注目的是江南地区的集团和城市的市民的活动。两者都应该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等级。他们同贵族大地主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城市的反矿监税使的斗争，时代特点是鲜明的。这种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标志着当十六、十七世纪时资本主义萌芽不但存在，而且应当说有所发展。”

十七世纪下半期到十八世纪后期则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被延缓的

时期。这便涉及清军入关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影响这一聚讼纷纭的问题。《四十天与一百年——论明清两王朝交替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代表性文章。文章认为，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社会是向着封建制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总趋势而变迁的，与当时世纪范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同步的。明末农民战争推翻了贵族大地主的残暴统治，扫清了我国进一步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但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农民军失败了，清军入主了中原，又将野蛮的封建专制和民族统治强加于中国人民，破坏了社会经济，尤其是破坏了江南的社会经济，使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陷于停滞，延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十七、十八世纪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而中国此时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被延缓发展的时期。中国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落后了”。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后期，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道路被歪曲，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总之，“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而没有资本主义确立的时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最主要特征。

造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地方经济历史悠久而根深蒂固，不易破坏，“起了一种维护封建生产关系的作用”。第二个原因，应当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始终没有形成对旧生产关系突破的条件。“第三个原因是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造成全国性的民族统一市场不易出现”，经济落后地区拖住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后腿。第四个原因是人口压力，“人口的压力，实际上吃掉了社会生产力增长的部分，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而难于突破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强有力的干预和影响”。“第六个原因是西方殖民势力的干涉、限制、压迫和侵略，使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道路被堵塞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业师在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同时，开始了对明清政治史的系统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收入该集的《论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明代政界的地域性从政限制》诸文探讨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关系问题，尤其是讨论了明朝政府对江南势力的限制、压抑政策，这一探讨是业师五

十年代对东林党研究的继续与深化，旨在揭示政治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是如何使旧的、落后的社会政治势力遏阻了新的、先进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壮大成长。

《读〈明武宗实录〉条记》、《明武宗和他所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明武宗与猪禁》诸文，是业师研究明代以皇帝为中心的贵族集团特性的系列成果，均编入该集。几篇文章皆以明武宗为典型进行个案研究，揭示了十六世纪明朝贵族处于没落找不到出路无可奈何的生存状态。

《论顾炎武在“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明嘉、万、天启三朝禁毁书院之政治文化背景》、《说“卢梈之狱”》等文章，集中代表了业师对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思想界状况、政府文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业师认为，虽然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本身存在许多弱点，但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社会现实已经在知识分子和思想界有所反映。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寻求为新的社会因素发展扫除障碍。但是，这种进步的思想探索遭到了专制政府的镇压，特别是在清朝专制统治下，明末的一些进步思想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成为绝响。

《“大礼议”与明代政治》、《论明末政局》、《孙嘉淦和雍乾政治》是研究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重要成果。业师指出，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政局是以皇帝为核心的贵族大地主专政为主，在这种专政上，各派政治势力，特别是反对贵族大地主专政的各派势力在政治上都很活跃，两种势力斗争十分激烈，但并没有消除贵族大地主专政这一阻碍中国社会历史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障碍是由明末农民革命铲除的。但是，清朝势力的胜利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专制政体较明代更加牢固。

《明代内阁与司礼监的结构关系》、《论明代的吏》、《论明代的官和吏》是研究“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官僚政治研究”的阶段性的成果。文章以别开生面的方式，以严谨科学和独到的见解，分析明代中枢政制和官僚机器运作机制，构成业师对明清政治史的最新探索框架。由于业师长逝，这一研究的最终成果没能完成，令人惋惜。

业师的学术研究方向稳定，涉猎广泛，极注意历史的时空联系。业师曾经多次强调：明清史是断代史，但这种断代史并不是机械的依王朝时间顺序来分割历史时代，而是因为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有自己的时代特点，这一特点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停滞和扭曲。研究明清史，不但要有中国通史的眼光，而且也不可囿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范围，“要冲破这些束缚，把明清史的研究放入世界的范围”。正是这种恢宏高远的学术气概，使业师的断代史研究即充满着中国历史的通史感，又不乏世界历史的全球意境，在微观上建树宏观理论认识。这一特点贯穿了业师整个学术生涯。不论是“少年之作”《明清史》，还是晚年论文《论公元十五、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若干历史问题》，都体现了这种学术主旨。

磊落人生

业师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一生。业师真诚信奉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上表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地位不动摇，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提出自己的学术论断。业师曾这样总结个人的学术经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着统一性，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公元十五、十六、十七世纪这三个世纪，是全世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确立的历史时代。世界的先进地区、重要国家几乎同时发生了相同的历史运动，明清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只是后来的归宿不同了，有的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有的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种不同结局的出现并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上，各国家、各民族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变革，也曾经产生过不同方式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在由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变革中，也会如此。这是明清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要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来建立明清史的科学体系。30年来我个人的明清史体系就是建筑在这理论基础之上的”。业师的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贯穿了业师全部学术生涯，他虽然创建了自己的明清史科学体系，但并不认为已经尽善尽美。他说“这种理论目前还不成熟，还必须继续探讨，使它逐步完善起来”。在晚年，

在病床上，业师也没有停止对明清史科学体系的再探索。他拟定了庞大的研究与写作计划，包括“顾炎武评传”、“东林党史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官僚政治研究”及对明清历史提出通盘新解释的“中国明清时代”。就在死神步步逼近的时刻，业师还在同研究生一起探讨“后封建主义”等问题。

业师真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表现在政治上，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理想奉献终身是他一生不懈的追求。从其早年投奔解放区，献身人民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事业起，就立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人生坚定志向。尽管由于历史的误会，曾被错划为“右派”，赶下讲坛、剥夺从事科研的权力，但是人生的坎坷和劫难，没能让业师消极、颓丧和沉沦，他的信仰不变、追求不变，1986年终于成为正式的中共党员。这是65岁的老年新党员。业师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做到在思想上入党。组织交办的事情，他一丝不苟地完成；组织的活动，他从不缺席。要知道，这是一位腿有残疾，年近七旬，手执拐杖，走路十分困难的老人啊，顶着风、冒着雨，甚至还踏着厚厚的积雪，去参加一次普通的组织生活会，怎不叫人感动！业师对事业孜孜追求，对个人名利却淡泊超然，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国家经济生活出现了些不良现象，如体脑倒挂、分配不公等等，一些学问人抵御不住金钱的诱惑，纷纷下海经商。而同时，学术的商品化也越演越烈。以业师的声望和地位，只要表示同意别人使用他的名义，无须亲自动一笔写一字，便可获得高额报酬。业师对此类感情美意不屑一顾，皆婉言谢绝。

生死观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业师的病其实早在1994年8月就已发作，症状是腹泻。医院诊断为肠憩室，不是什么大病。这显然是误诊，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治疗时间，既然不是大毛病，大家也就没引起重视。尽管症状愈来愈严重，身体日益消瘦，业师只是吃些治腹泻的药，仍然坚持给博士生上课，每天还要工作6小时，编订《下学集》。到1995年5月，感到难以忍受，便到医院再次检查，结论是无情的：直肠癌晚期。这一消息对于业师的亲属、学生和所有爱戴关心他的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大家遵循习惯做法，对患者封锁病情。但是，业师很快就从症候、治疗、用药情况综合判断了自己病情真相。业师非但没有悲戚、没有恐惧，反而平静地劝告大家不要为他

的病过分操心，不要耽误了学习和工作。住院期间的护理一直由师母王玉珍一人独任。业师对学生说：“人到头来都免不了一死，只不过早些和晚些罢了。可是，人生的意义却不同。一个人要是在有生之年能恪尽职守，尽了自己所能，做了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生命虽然短暂，却远胜于尸位素餐、行尸走肉般的苟活。我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一生中也尽了自己的所能，并不怕死，至于是否有意义，那是后人评价的事。”

在生命最后的3个多月中，业师除了与病魔搏斗外，抓紧分秒做了三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一是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并坦诚地指出党建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向学校有关部门陈述有关学科建设的意见；三是整理自己未完成的课题，向学生阐述有关一些重大问题的新构想新认识。这是业师十分负责的人生最后交代。

古人云，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此三者，业师兼而有之。著书立说，论著丰厚，此立言之谓；敬业爱岗，淡泊名利，信仰不移，此立德之谓；耕耘教坛，教书育人，桃李芳菲，不正是为国高教事业立功吗！

业师离开我们已经10年。死生分两界，学术薪火共传承。我们的思念如绵绵溪水，在胸臆淙淙流淌，永不停歇，永不绝响。

及门弟子 赵毅 罗冬阳

自序

自编文集，又自作序者，并不太多见。最好是请同道学友来作序，以增光篇幅。但自家作序，有自知之明的好处。于是我在前面写了如下一些话。

这本文集是我在40多年中读书学习，也是在教学和科研的历程中所做出的一点成果。在这里我不想对它褒扬多少，但也不想把它说成一无是处。这就是我自序文集的宗旨。

回忆我在大学读书时，曾亲炙谢刚主先生的教诲，对读明清史料发生浓厚的兴趣。当时兴趣是多方面的，对秦汉史、辽宋金元史都想学习，原不曾想一生从事明清史的研究。但是谢先生的一部《晚明史籍考》对我来讲有了很大的吸引力，于是研究明末历史、南明史、清初史就成了我的一种“癖好”。大学临毕业时，除写毕业论文，就是蹲北大图书馆读明清史有关史料。《明史》只读了一遍，其他更多的是南明史料。1948年，一种难得的机遇，我在解放区的东北大学从事中国通史教学工作。当时，最迫切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很自然要和中国历史问题相联系。不久又开设一门断代史明清史。新史学基础理论的提高，要求自己的历史业务知识必须相应提高，否则理论越学越空。当时凭着年轻力壮和钻研业务的盼求，每天在课后，都在资料室按部就班地看《明实录》，一边看一边摘抄。此外，也一部部去读有关明清史的其他史料和近人著作。课余和读书之暇，开始写论文。我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他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得益最深。但是要想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明清史研究上，还是要花大力气。用了几乎3年的工夫，才写出一本《明清史》，没有想到这本书出版后，竟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我知道写这本书时我才34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明清史料掌握的水平都不高。所以，我现在常常把这本书叫做我的“少年之作”。因为它表现出我在不少方面